

荒石上的沉思

李景雄

本社社長(1974-1993)

崇基學院校牧；講師(1969-1971; 1976-1977)



「香港是一塊荒石……一個荒嶼，房宇無幾。」鴉片戰爭結束後，1841年英國外交大臣包瑪士頓勳爵（Lord Palmerston）聽聞中國割讓香港予大英帝國時如此回應。1842年《南京條約》正式將香港歸屬為永久殖民地；1860年的條約加上九龍半島；後於1898年租借新界九十九年。直至1997年，香港島、九龍半島、新界一併歸返中華人民共和國，結束英國管治香港的時代。

縱使歷史事件所涉及的是彈丸之地，卻充滿著戲劇性的演變，無論是經濟、政治、文化的層面而言，香港從一漁民小村落躍身成為繁榮大都市，亞洲重要交通樞紐之一，世界級金融中心。就文化而論，或說香港是文化沙漠，亦有人說是中西文化融匯點。以政治而言，以「一國兩制」繼續存在，成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個特別行政區。

驟然想起英國詩人約翰·鄧恩（John Donne，1572-1631）的詩句：

無人是孤島，獨自存在，
任何一人是大洲之一片，全部的一角

鄧恩用島嶼與大陸連結的隱喻，形容憂戚與共的人生，引出人與群體的連繫。本文就是站在被稱為荒島的香港，隨著時代戲劇性的進程和機遇，從不同角度觀望、反思、默想，且看有何啟迪。

石頭上的法治與財富

香港後來加上九龍半島，又有新界，還有海域中大大小小島嶼——大岩石、小沙石遍地。開埠以來的一百有多的年月，這塊「荒石」演變為盛載著又高又宏的大廈，密密麻麻的住戶，破舊的亦有新式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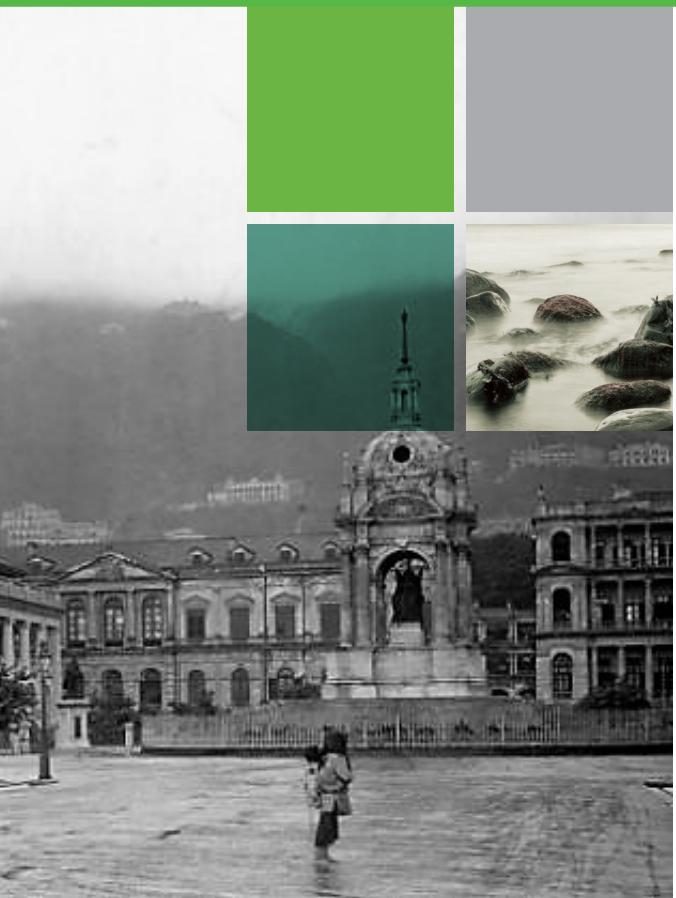
既言石頭，油然想起香港歷史性的中心地帶，皇后¹像廣場。皇后像廣場的地台，乃是建立於用石磚填補香港島中部山坡下的海邊平地而成。廣場最早的大型建築物是當日的最高法院大樓（The Supreme Court Building，1912-1980）。該法庭大樓用希臘多立克式圓花崗石大柱支撐，前上樑中段（大圓頂下）矗立著戴上遮眼布的希臘女神，象徵法律是公正無私的，正如大柱石象徵法律是穩定社會的基礎。這座最高法院大樓，於1985至2011年改為立法局之用。2015年至今是香港終審法院（Hong Kong Court of Final Appeal）的樓址，這座建築物由始至終與法治制度結下不解之緣。

香港一百五十年經歷戲劇性的演變，卻非任何人可預知。總的來說，香港的經濟蓬勃，尤其是自1970年代起，反映於樓宇的神速建設。這是香港人集體智慧的成果嗎？在某程度上，香港人——尤其是工商界——加上海外的夥伴，的確勤奮能幹，果效非凡。另一方面，經商也免不了剝削勞工，導致貧富懸殊。



耶穌所言聰明人、愚蠢人建房子的比喻，商業社會也要有道德的原則。就道德原則說，如公平、信實、忠誠，聰明人即是實踐道德原則的人（無論是工商界或是勞工界）。馬太福音第五章，論八福、論鹽和光、論財物、論法律，都是道德和靈性生命的根據，世世代代皆可應用，亦正是天國的道理，更是可實踐踏地的生活。

先前提及香港的法治精神，登山寶訓亦有一段論法律（太5:17-20）。耶穌先提摩西的法律和先知的教訓，那是重要的。不過耶穌稱他來不是廢除，而是成全其真義。如何用諸香港的法治精神？不錯，大可珍重香港承受下來英國或「普通



法律」（common law）傳統，但基督信徒按著耶穌的教導，不單謹守法律，並且教別人也同樣遵守，在天國裡便要成為大的。換言之，他們一定比經學教師和法利賽人（視法律為繁文褥節）更加忠實地實行上帝的旨意。耶穌這裡教導天國之道的精意，豈非有可行諸今時今日香港治理法則之餘地？

現代經濟學之父亞當斯密（Adam Smith）著《國富論》（*Wealth of Nations*, 1773）倡言市場的「供」（生產 / 勞工）與「求」（購買 / 人力）互動，顯示價格/工資帶來恰當價值，籍此推動經濟發展。這是資本主義/自由市場發展

的秘訣，配合現代機械生產力，則國家富強起來了。《國富論》精闢闡明資本主義/自由市場的自由調整規律，猶如背後有「無形之手」在推動，促使國家社會富裕。

《國富論》之前亞當斯密著有《道德情操論》（*Theory of Moral Sentiments*, 1769），論述人性具備道德情懷，固然有自身利益的追求，亦賦予理性、良知、倫理意識，呈現於群體生活中的利己益群。這套道德情操觀恰好與自由經濟相輔相成。

亞當斯密是啟蒙時代的產物，無怪他的經濟學和人性觀在在，顯示出理性主義思維。然而資本主義發展下去，顯示出經濟操作以及人的道德情操並非如此單一。亞當斯密後來稍為加以調整，建議需要政府加入管制及法律檢控。不過輕微措施無法應付資本主義持續發展的不良後果，於是刺激社會主義甚至共產主義的強烈回應。

獅子山下的精神

座於九龍與新界之間的獅子山，有一觸目獅子頭形的大石（Lion Rock）為山峰。獅子山下九龍的一面是大平原：中間是九龍塘低密度豪宅區，左方是深水埗，人煙稠密，聚集較低收入家戶的舊式「唐樓」，外觀不講究。1950年代國內同胞逃難來港，該區更加擠迫，而往右伸展，不少難民，一家大小跑出來，分文無幾，唯有在獅子山脚下山邊蓋木屋為居所。1953年大火燒毀木屋，成千上萬無家可歸。那時聖公會何明華會督說服政府建立臨時徙置區。石峽尾、黃大仙等地一排一排的徙置區屋邨建立起來。那些屋邨簡陋而擁擠，可是有蓋頭小房棲身好過流離失所。

獅子山下居民不屈不撓，一家大小，勞心勞力，想盡方法維持生計，爬出低谷，形成一種「獅子山精神」。一首《獅子山下》歌曲（黃

霧詞、顧嘉輝曲）家傳戶曉，廣傳「獅子山精神」。歌詞（部分）：

人生不免崎嶇，難以絕無掛慮
既是同舟在獅子山下且共濟
棄區分求共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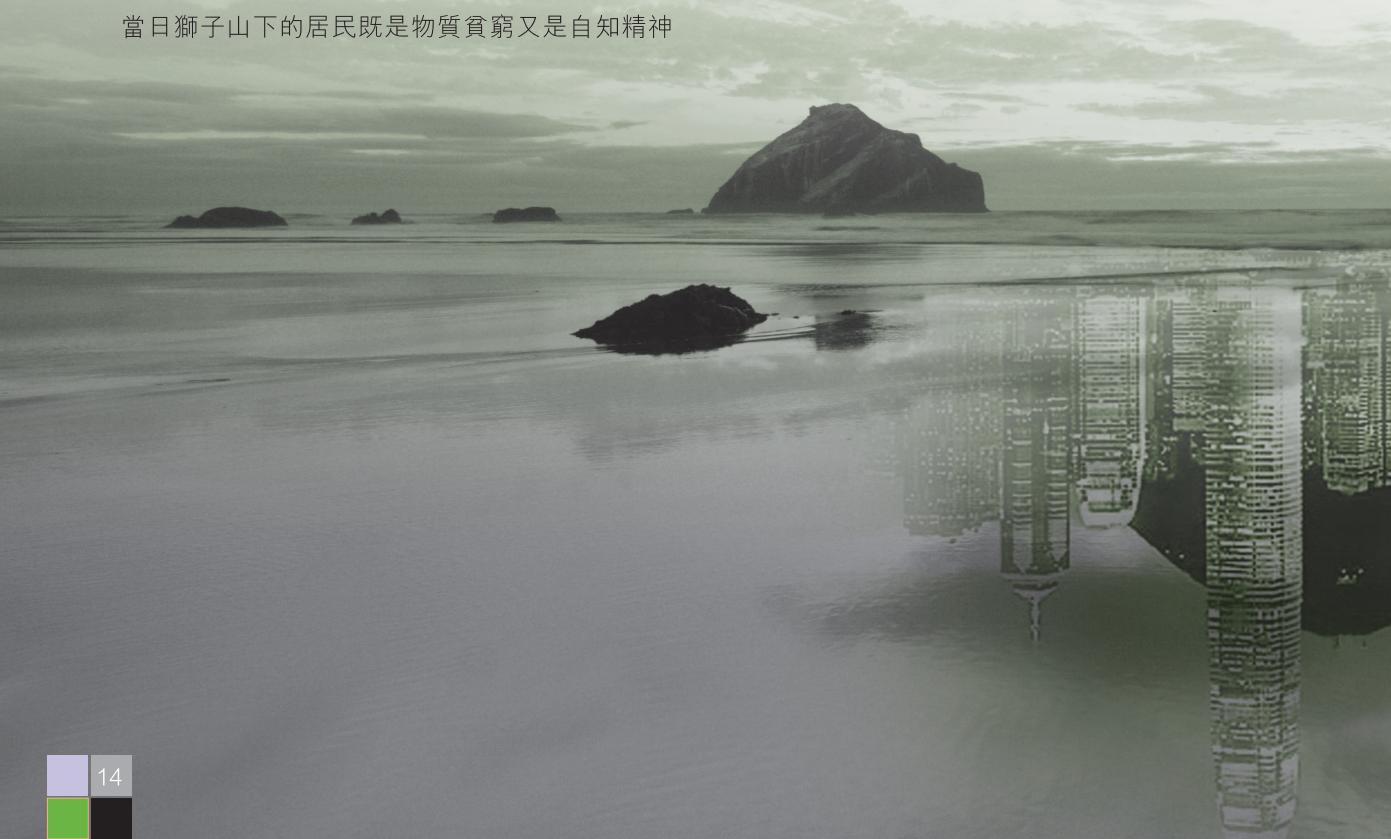
教會方面，應急做了不少救濟事工，如派救濟品、設立雛型社會服務中心、開辦天台幼稚園及小學。宣教工作隨之而催生。

「貧窮的人有福了，因為上帝的國是你們的。」（路6:20）「虛心的人有福了，因為天國是他們的。」（太5:3）**「貧窮的人」（the poor）、「虛心的人」（the poor in spirit）**是等同嗎？此中可能有出入，然而亦可貫通。Poor in spirit（和合本譯為「虛心的人」）原意是「自知靈性貧乏的人」（巴克萊《馬太福音詮釋》）。若然物質貧窮而同時自知靈性貧乏的人無疑是有福的，因為他們虛心接受天國的福分。無法估計當日獅子山下的居民既是物質貧窮又是自知精神

空虛而接受福音的有多少，但兼用路加福音和馬太福音（「八福」之首）的版本肯定道出耶穌登山寶訓福音重要的信念，放諸四海皆準也。

繞過獅子山，山腳斜滑至平地，就是大圍，接上沙田。這平原本來是禾田草堆，1970年起規劃為「新市鎮」，不到數年十載，果然一個又一個的小新市鎮建立起來，如禾輦、沙田圍，再直伸展出去。新市鎮是新興中產階級的樓宇和商場。這些新市鎮是有規模的，城市設計和環境質素都不錯，顯示香港社會有新中產階級的興起，反映香港經濟穩步上揚。

表面觀之，新市鎮物質上相對性的富裕，產生世俗化的價值觀。物質上的滿足排除了靈性的渴求，這是普世現象。不過沙田有車公廟，每年農曆新年車水馬龍，市民湧來燒香求籤（其實是民間宗教伸延求物質的福？）。該區內的佛教廟宇香爐興盛者有之，靜思修持場地亦有。天主教一大教堂十分興旺，基督教幾間教堂強化小組工作。吸引不少青年及中年會友。



真的有人既是物質貧乏又是自知靈性貧乏嗎？若有，他們在物質貧乏之中有虛心去求精神上的滿足？他們是有福的，是屬於天國的子民。

記得一主日，我應友人邀請前往擴展中沙田圍區住屋地下一間小教堂崇拜。附近居民及教會教友不算得都是新興中產階級，教堂卻有社區意識（sense of community），強化小組活動，藉此增加教會與周圍居民的社區連繫。崇拜開始前，門前有教友招待員熱忱歡迎參加崇拜的人，尤其是留意初次來教會的人。崇拜結束後，筆者在教堂門前空地樹蔭下與教友交談，讚賞他們的團契活力和社區意識（原來教會舉辦各種社區關懷活動）。

大石山上的精英

香港大學成立於1911年，是典型的英國殖民地高等學府，當然以英語為主要教學言語，培育了香港歷代精英分子。

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中國恢復大國的地位，雖然內戰未平息，人們盼望總有一天中國會一統，中華的長遠文化能延續下去。就在這樣的

歷史背景，香港第二間大學，定名香港中文大學（以下簡稱「中大」）孕育出來。顧名思義，中大本來是以中文為主要教學言語，而後來英語並用，中國文化也要加以重視。當時香港已有三間認可的大專學院：崇基學院、新亞學院、聯合學院，分佈於香港、九龍各地。後來就結合這三間學院，成為中大的創校學院成員。

大學校址最後選中馬料水附近的一座山。該座山已有崇基學院為校園，其他兩學院，並計劃中的研究院、醫學院、大學圖書館及其他大學總部建築，則建立於擴展的山頭大校園。該山草木之下是大石。筆者眼見從剷除草木為一巨大禿石起，1963年正式啟用。

崇基學院有基督教背景，繼承國內十二間基督教大學的傳統。原本風格受美式大學學院（college）影響，首一、二年是基礎通識教育，三、四年級入專科學系。崇基學院一特有建築物是教堂，是全體學院教員和學生聚會場地或崇拜之所。崇基最初有神學組，屬宗哲系，後來則成為崇基學院神學院，是大學架構下的基督教神學院。

新亞書院於1950年代創校，由國內學者移居香港，以宏揚中國文化為宗旨。其中有名的新儒家學者如牟宗三、錢穆、唐君毅，他們的講學吸引大量從內地來香港的青年知識分子。原址九龍的新亞書院學術水準相當高，以中文（普通話）授課。中大成立之時，新亞書院已是有規模的專上學院，被邀加入為成員學院，遷入沙田的新大學校園。

另一大專學院是聯合書院。聯合書院1950時代集結遷至香港的五所大專學院而成，課程側重實用學科，如商科及其他社會科學，學術水平已達標準，足以成為新成立大學的第三成員學院。

大學行政總部、研究院、大學圖書館、醫學院、演劇大樓、體育館、教員及學生宿舍、中藥研究中心等等，相繼矗立於規模宏大的中大校園。本來的一大石山，驟然變為壯觀的校園，綠蔭樹木長成，靠山環海，全景壯麗優美。

中大的學院由三間後來增至九間。各學院擁有個別院舍及管理方式，而承傳各別的文化傳統。九間學院又在一大學架構下有共同的教學及研究設施。

中大諸學院之中，筆者與崇基學院情繫尤深。本人曾兩度任崇基學院校牧（1969-1971，1983）兼任通識科講師，又是崇基神學組最早期講師之一。崇基學院以外，與新亞書院間接連上關係：本人喜歡聽新儒學講座，特別欣賞唐君毅教授對基督教思想較開放的態度，從儒家學者增廣對中國文化的認知。

回顧曾是荒蕪小島的香港發展史，一個世紀多後，商務發達，經濟繁榮。香港文化，多元繁雜，中西文化俱備，而在一間高等學府互相交流，這是大學生命力的徵兆。中大或多或少有此徵兆，無可否定。

1988年，第一屆「世界耶儒對話會議」在中大舉行²，主要由本人、沈宣仁教授（崇基）、劉

述先教授（新亞）共同策劃，代表基督教及儒家的學者，來自中外各地達八十餘名，雙語（漢、英）並用，是大型中西思想文化交流的盛會。耶儒對話的重要性在於基督教信仰與中國文化的主流儒家思想用對話方式、互相表述並吸納，那就是中西交流的一個活證，各方相得益彰。

崇基學院教堂當然是弘揚基督教信仰的場地，不過在大學教育環境中宣教不是單向式宣講，而必須應對宗教信仰以外的各學術能量。一間重視學術的學府容許教會有這樣的空間去宣揚宗教信仰，表現一種開明的教育觀念。反過來說，學術文化亦可因宗教信仰的薰陶而受益。

中大架構下的神學院扮演特殊角式。基督教沿西方傳入中國，因而常被認為是西方的宗教。可是，基督教的發源地是中東，後來經過世界多個地域，成為普世性的宗教，信徒廣遍五大洲。至於今日所稱之「神學」，課程不只是西方言語寫成的神學典籍而是聖經，聖經原文是希伯來文、希臘文，故神學課程亦包括這兩種言語（雖然是入門）。再者，近年來有所謂「本色化神學」、「處境化神學」、「融入文化神學」諸神學模式的興起，與經院或系統神學、教義神學並列。神學院內的「基督教中國宗教文化研究社」，就是致力此另類神學模式，鼓勵用漢語並在亞洲處境（包括香港）及中國文化領域中作神學反省功夫。換言之，崇基學院神學院的功能於中西交流的事業上有所作為。神學院現今有來自海外的神學生，如緬甸、馬來西亞、英國、美國等交換生。

無人是孤島

回想香港一荒石小島割讓英國為殖民地，演變為回歸中華人民共和國以及在「一國兩制」原則下，成為特別行政區的命運。世事千變萬化，看來不過小島一個，卻與一大家國脈脈相連。不

但地線如此，經濟、政治、文化亦然，而且變幻莫測。鄧恩的名詩道出了死亡與永生的信念：

死亡，別狂傲，
縱使有云汝蠻強且可怕，
非然。
曾喻死亡致人於死地，
其人不死，死亡不能滅我……
短暫睡眠，醒來永生
死亡不再，死亡必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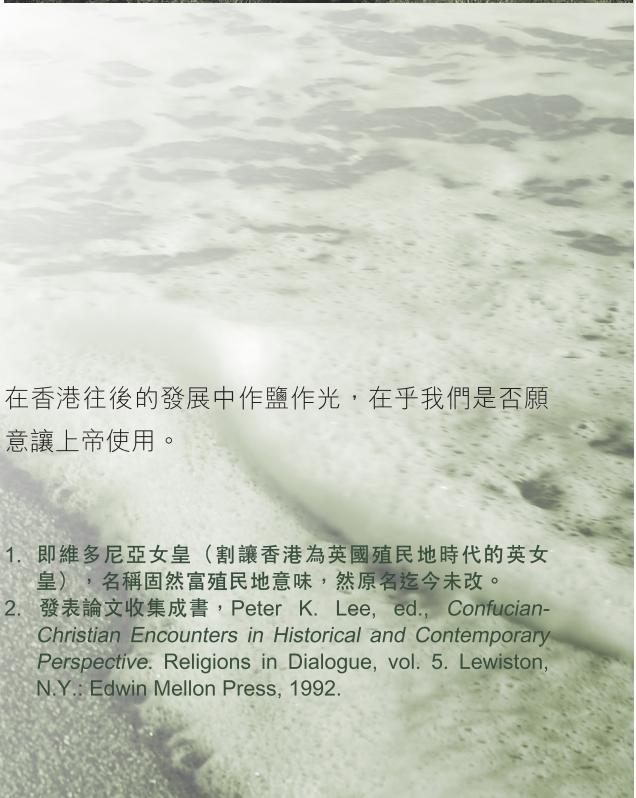
詩人豪言壯語，克勝死亡獲永生。這是基督教的信念。

用諸華夏文化的興亡：日本侵華；中國內戰分裂；「人民站起來了」；不久之後，「三反五反」國家大亂；國家政黨內部鬥爭連綿，人民脊貧、文化低落；文化大革命翻天覆地；經濟稍有起色，又來「六四運動」。華夏文化禮崩樂壞，奄奄一息。

然而，進入二十一世紀，中國經濟突然起飛，驟然成為政治舞台數一數二大國。在中國西北連結中亞一帶的經濟發展路線，拓展為全球性的新連結，以龐大經濟、物力、人才資源，互相帶動發展。

至於細小的香江，據稱在「一帶一路」計劃中亦可幫忙祖國扮演一些角式，以及集資帶動發展中的國家，和輸入金融界人才。本港幾間神學院默默耕耘培訓東南亞各地教會牧職人才，幸好香港容許學術自由、宗教自由，好讓香港神學教育界全人盡一己之力。

主耶穌曾宣告門徒彼得要稱為磯法（約1:42），無人能夠想到，籍籍無名的漁夫會成為教會的磐石。這全是上帝的選召和恩典。香港由荒石發展成為國際大都會，我們作為信徒，能否



在香港往後的發展中作鹽作光，在乎我們是否願意讓上帝使用。

1. 即維多尼亞女皇（割讓香港為英國殖民地時代的英女皇），名稱固然富殖民地意味，然原名迄今未改。
2. 發表論文收集成書，Peter K. Lee, ed., *Confucian-Christian Encounters in Historical and Contemporary Perspective. Religions in Dialogue*, vol. 5. Lewiston, N.Y.: Edwin Mellon Press, 1992.